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十七辑

文化史与史学史

Cultur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卷外篇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十七辑

文化史与史学由

Cultural History and Hist

主编 陈恒 王刘纯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 第17辑 / 陈恒, 王刘纯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47-8524-5

I. ①新…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3029号

新史学 第十七辑

主 编 陈 恒 王刘纯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郑强胜

责任校对 钟 骄

装帧设计 王 敏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35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编委会

主 编 陈 恒 王刘纯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旭(厦门大学)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向 荣(复旦大学)

刘北成(清华大学)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

李剑鸣(复旦大学)

何兆武(清华大学)

沈 坚(浙江大学)

张广智(复旦大学)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

钱乘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Chris Lorenz(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Donald R.Kelley(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Gunter Scholtz(德国波鸿大学)

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Jörn Rüsen(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

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Lucian Hölscher(德国波鸿大学)

Richard T. Vann(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以欣(南开大学)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

刘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李隆国(北京大学)

宋立宏(南京大学)

张前进(大象出版社)

陈 雁(复旦大学)

陈 新(浙江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周 兵(复旦大学)

郑强胜(大象出版社)

孟仲捷(华东师范大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徐松岩(西南大学)

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美国)

History and Theory(美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美国)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美国)

Review(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Contents
目 录

专题研究

- 1 文化史相关问题 [英]彼得·曼德勒
- 25 “看”的历史理解:罗斯金与“批评”的文化史 陈书焕
- 35 从观念到概念再到隐喻:德国的思想史传统与复杂的语言构造
..... [阿根廷]艾里阿斯·何塞·帕提
- 56 “不凋谢的声名”
——论印欧语系早期诗歌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白 钢
- 69 古典时代希腊士兵的日常生活研究 [美]李·布赖斯
- 89 《排华法》与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迁转复归 伍 斌
- 112 Robot 计划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丘吉尔政府挑战固定汇率的尝试 毛锐 赵北平
- 125 俄国革命的精神解读 解国良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 147 亚述史学史 [美]阿尔伯特·奥姆斯塔德
- 186 克罗齐历史学论析 张作成
- 199 全球化与观念史 [美]阿兰·梅吉尔
- 207 1868—1968 年现代史领域的若干学术趋势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评 论

- 228 《自然史》与丝绸之路 李铁匠
- 248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研究综述 顾海萍

- 260 国内学界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史研究述评 王伟宏
- 271 历史应该如何书写
——读《致命的海滩》 陈仲丹

光启讲坛

- 277 冷战在这里转向
——中苏同盟兴衰的原因、过程及影响 沈志华 陈兼

专题研究

文化史相关问题*

□ [英]彼得·曼德勒 (Peter Mandler)

在这篇论文中,我想向研究文化的历史学家阐述一系列方法论问题。由于历史学家这个职业整体上正在经历一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因此这些问题可能与所有类别的历史学家都息息相关。现在可能是提出这个方法论问题的理想时机。这是因为,之前的十余年间,我们的认识论出现了强烈的碰撞,知识最根本的基础受到挑战。所有历史学家都受到波及,但这些变化在文化史家中造成了最大的冲击,这是由于相较于研究结构或过程,他们对如何表述历史更感兴趣,因此必然在历史本身如何进行自我表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受到影响最大。此外,文化史家的领域与文学研究者相连或重叠,在这个领域,认识论的讨论(或者至少说影响)长期以来都普遍存在。然而很多文化史家却没有对此方面的讨论加以关注。有些人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却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专长而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技能一般来说并不被认为是历史学家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么说也许并不恰当,至少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工作中因为这些问题的困扰而筋疲力尽。我们一遍遍听到对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也无法说出什么新东西的论断,只好准备做出妥协,只能开始重构那些我们知道并且能说出的东西。由于我们已经不能无视历史学发展至今的理论,不能对此采取傲慢无视的态度,因此我们只能谨慎并节制地从事这项事业。我们都了解,也在实践中试图确认,在历史学的表述中,意义是不固定的,而能够证明这些意义的证据仅仅是历

* 此文之前的版本在2001年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文学与文化史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的一次研讨班,以及剑桥大学文化史研究生讨论会上宣读,并在2002年第71届“英美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机构会议”(Anglo-American Conference of Historians,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上做过主题演讲。感谢这些活动组织者的邀请以及听众的反馈。同样感谢本杂志编辑部(《文化史与社会史》杂志,译者注)及其有益且大量的评论。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德博拉·科恩(Deborah Cohen)和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在这些议题上启发了我的思考,但对于本文结论的任何责任都由我个人承担。

史的一个侧面。我们试图从过去中提取并重现这些意义,但是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然而,我希望现在我们同样能够认识到,即使意义是不固定的并且是处于变化中的,但它在不同程度上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代中变化的,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并描述在某个时代节点上处于稳定状态的意义(并且希望更好地解释那些不稳定的状态)。这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证据仅仅能够说明历史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选择其中的一些证据比另一些更好,比另一些更适合解释特定的问题。简而言之,即使对历史一知半解,也比一无所知要好。

然而,经历过认识论危机后,我们发现自己依然缺乏指导前进的路标。很多不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人——以及许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认为这项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仅仅是浏览过去人们陈述的段落,从中随意取样,并一再重复着进行解释。很多文化史确实以这种方式写成。很多文化史家花费过长的时间沉浸在认识论上,恰恰因为它充满乐趣:在试图对历史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那些可以由自己自由安排的语言,那些被自己发明的观点,那些可以对意义进行自由转换的双关语,以及那些因为可以自由连接不同的事物与意义而感觉到的热情与激动。在文化史的写作中,一切的重点在于从规则(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中解放。作为一个拥

有社会科学背景并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人,我能够意识到并且与其他文化史家共同分享着这种冲动。我不愿意回到数字、因果论解释、绝对化和封闭的专横中去;我渴望获得一些关于表达和解释的自由,既能在千变万化的文化本质上忠于自己选择的主题,又能保护我自己事业上的技巧和创造性的空间。但我同样希望成为一个理性的话语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能够通过给予共同的证据、采用评估和解释标准而被证实。我希望文化史能够与近邻的学术领域和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交流,出于这一目的,我认为,规则的重新注入是必要的。为了彼此交流,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交流,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论点和分析比起之前所做的那些工作更经得起他人的评价,甚至是检验。这对关注方法论的细节提出了更多要求。

从事文化史的一些技艺娴熟的大师——比起历史学科,他们中更多人是来自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被吸引至这个领域并非因为它看起来“容易”,而是出于相反的理由,因为它看起来“困难”。他们热爱这种源于尝试去构建并发展“理论”而生发出的哲学氛围和智力深度(构建理论是必需的,因为苦想冥思是有益的,也是有害的,这是因为暧昧不明只能隔绝出一个封闭的专业空间,而杜绝了学

科间的交流)。^①然而,这种“困难”的文化史有时也被视为较为“容易”的问题。在文化史中,“理论”时常被用来取代一切方法论问题的位置。大家的观点似乎是,假如我们的发现或论点能够恰好符合一些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那么就将满足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方法论思考;理论提供了此前我提到的组织论点所用的共同语言,同样提供了许多社会科学相关的背景,我们需要它们来确保我们的陈述恰好能够被纳入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特质貌似真实的理解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合乎情理的。文化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一些便利的理论,这种研究和写作的方式是理性和严肃的。理论通常发源于一些人类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并通常代表了如何在更广阔的环境下解读这些实证证据的深刻洞见,甚至一些在哲学上最为抽象的后现代理论,同样根植于人类学的探索和语言学的分析。但假如我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借用“理论”,我们应当更公正、更系统地进行这样的工作,在更广泛的知识结构范围内进行,并且选择那些更适合我们的问题和证据的理论,而不是自动服从于那些其他人用过的理论(他人常常出于不同理由、带着不同意图去使用这些理论)。在我的结论中,我将提供一些关于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处理理论的建议。

如我的题目显示的那样,在本篇论文

主要部分,我将不止强调一种,而是三种一直在折磨文化史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在每个问题中我将用一个对现代英国文化进行书写的特定的案例研究来阐释它们。这些案例研究自然与我的研究兴趣紧密联系,但我试图确保它们集中于那些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概念——即种族、现代性和国家。

关于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的奇异历史

我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被放置在一个问题的模式中:“谁的话语?”

在历史学中,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是卓有成效的,既扩展了我们研究主题的范围,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意义的脆弱性和多样性。深深投入文本中,并组织出能够进行创造和推论的空间,不仅令人愉悦,同时也十分有益。然而,语言学转向会让我们忽略其他必须承担的责任,包括评估文本的意义以及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它在更广阔的论证领域中的重要性,它的“投射”(throw),它的传播和意义;也就是说,文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中所处的状态。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确定这种话语究竟是什么,还要确定它是属于谁的话语。这就再一次要求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指出一个文本在其他文本

^① 对这种“困难”的解释,见 Colin McCabe 给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做的序言,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 pp. ix-xix。

上留下了哪些能够进行论证的痕迹,以及对相关“投射”——重要性或意义——的理解。这必须是一个经常进行的、循环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偶然涉猎。简而言之,一名文化史家在自己的大脑里必须拥有一张完整的关于文本意义的地图,并且必须寻找到将这张地图的意义传递给读者的方法。

我用 19 世纪中期的种族话语来阐释这个问题。在对种族的研究和理解中,似乎存在着普遍的一致意见,由生物学研究成果导致的严格的种族等级话语,在 19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英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在这个时期之前,持久稳固的启蒙运动和传统的基督教模式或多或少地加强了对于人类起源的一元理解,并因此导致了一种人类具有一些普遍特征的占据主流的概念。尽管自共同的起源之后,人类各个种族之间就开始产生区别,这样的观念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基督教思想都倾向认为,这种分化和区别只是一种相对表面的状态——一种气候环境或历史演进导致的结果,因此依然受到“文化”(无论是以理性主义还是以宗教的形式存在的文化)普遍化效应的影响。同样,在史学界似乎存在着一种意见,即认为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一些事情发生了,并在之后导致了启蒙和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怀疑,在对种族

的理解方面更加重视生物学上的区别,态度更加尖锐。19 世纪 40 年代发生了什么? 部分是因为欧洲大国力量的全球化,欧洲的帝国正在扩张,英国开始被视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1815—1850 年和 1880—1914 年这两个时段实际上比起 1850—1880 年这个时段更为重要。部分是因为欧洲内部民族思维的兴起,特别是 1848 年之后,但在这方面依然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比如这种思维是否在英国比在其他大陆国家更为明显? 还有部分是因为,在整体上,人类的生物学知识和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逐渐增加并传播,这来源于达尔文主义革命,尽管在一些特定方面达尔文主义是支持一元起源论,甚至是无种族性观念的。^①

对于种族区别的生物学话语是如何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广泛传播的,我一直表示怀疑。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这个时段之前英国存在过甚至流行过“文明”和社会(而不是生物)进化论的话语,这在英国比在大陆国家和美国来得更加繁荣。但我毫不怀疑,这个时期在更古老的启蒙以及基督教话语和新的生物种族主义话语之间存在着争论。问题是,在旧的人类拥有共同起源的话语,向新的生物学上各个种族之间有质的区别的观点转变的过程中,如何衡量这种变化随着时

^① 这方面的优秀著作包括 George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Free Press, New York, 1987);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Harvester, Brighton, 1980); Nancy Stepan,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Macmillan, London, 1982); Catherine Hall, *White, Male and Middle-Class* (Polity, Oxford, 1992)。

间推移在现实中起到影响?

出于政治方面的明显理由,文化史开始对现代世界的权力话语中种族的存在更为敏感,英国现代文化史家也自然地开始寻找和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种族化”的话语。为了达到目标,他们通常选择两种策略中的一种。其一是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思潮中的权威人物,并探索他们的思想中此前并未或很少被发现的种族主义成分。例如,乌代·辛格·梅塔(Uday Singh Mehta)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对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对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①的重读。这种计划有其优势,因为在其中一些人物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很多未被考察过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不能在这些被考察到的种族思想之上赋予太多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仅仅“借用”这些人物,因为他们的其他思想而被赋予到他们身上的文化权威身份,再将这种权威转移到他们的种族思想上,认为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我们应当仔细考虑这些人物是如何成为权威的,这在20世纪思潮中与19世纪一样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过程。例如,密尔的思想很明显打上种族主义烙印的时期——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即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当他依然处于对边沁功利主义的强烈厌恶之震动(这种反应,他是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是19世纪对18世纪的反应)时^②——他的声望还没有建立,其作品的读者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正如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揭示的那样,他的影响力在他生命较晚的时候才开始建立,特别是在他死后,而且是关于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作品在19世纪后期给他带来了声望,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而非政治作品《论自由》(*On Liberty*)和《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③尽管在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作品中也有机会能读出种族方面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是十分明显。同时,密尔一生被引用最为广泛的片段是出自《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抗议:“在所有脱离社会和道德对人类心智的影响的粗俗风格中,最为粗俗的就是将行为和特质的多样性归因于遗传来的自然区

^①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9), 特别是 ch. 3;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Routledge, London, 1995), 特别是 ch. 3; Catherine Hall, “Competing Masculinities: Thomas Carl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ase of Governor Eyre,” in Hall, *White, Male and Middle-Class*, pp. 255–295.

^② Mill to Charles Dupont-White, 6 Apr. 1860;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33 vol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1981–1991), vol. 15, p. 691.

^③ Stefa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Clarendon, Oxford, 1991), ch. 8.

别。”^①一些人将密尔这样广为流传的反种族主义观点放在一边,而是转向另一些更有希望读出种族话语的文本——那些他年轻时的作品,以及之后的一些政治学作品,却不考虑是谁阅读这些文本,出于什么目的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它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换句话说,“谁的话语”),而仅仅依赖于“密尔”这个有魔力的词来阐释这些文本的重要性。^②

对卡莱尔的研究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凯瑟琳·霍尔说卡莱尔突破了基督教废奴主义建立的“论证框架”,并在1849年用《黑人问题》(*Negro Question*)这篇文章走出了一条完全建立在生物性上的新种族主义道路。她宣称,卡莱尔用这种方式“决定性地转变了虽然不平等,但却是废奴主义者所依赖的温和体制”。据称,他以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阐述清楚人们已经感觉到却从未清晰表达出的一种情绪,“他已经阅读出时代的迹象,并确切地把握住了民族的脉搏”。另一方面,他同样将自己的权威放置在这

种情绪上,从而增强了这种情绪,“他作为文化评论者的分量确保他拥有大批读者”。^③这些是很宏大的主张,它们需要实证。情绪的变化很难解释清楚,霍尔说,在卡莱尔之前没有人清晰地表达出来。然而,卡莱尔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影响力却是可以评估的。我们可以考察《关于黑人问题的讨论》(*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这篇文章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这些读者都是卡莱尔通过其他受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带着强有力的基督教特质)赢得的。这篇关于“黑人问题”的文章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他的权威地位?更多的证据表明是后者。例如,众所周知,阿诺德将卡莱尔描述为“道德恶棍”^④,正是对这个观点最好的例证。金斯利(Kingsley)和白芝浩(Bagehot)都谴责卡莱尔对于由善法锻造或上帝造物构建的道德上的进步的低估。^⑤卡莱尔的助手乔治·道森(George Dawson)——霍尔时常引用他的话并作为自己下结论的基础——也有时会尽力使自己与卡莱尔的

① Mill, *Collected Works*, vol. 2, p.319.

② 见 Georgios Varouxakis, *Mill on Nationality* (Routledge, London, 2002), 这是近年来澄清这些误解的尝试。

③ Catherine Hall, “The Nation Within and Without” in Catherine Hall, Keith McClelland and Jane Rendall, *Defining the Victorian Nation: Class, Race, Gender and the Reform Act of 18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pp.195-197. Hall 此后一直富有雄心地对陈述领域进行审视,至少在一种环境下,见 *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Polity, Cambridge, 2002), 这本书并不那么依赖卡莱尔的“框架的打破”,尽管作者在第 378-379 页重复着这个结论。

④ Arnold to Clough in 1849, 转引自 Nicholas Murray, *A Life of Matthew Arnold*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96), p.99. 见 Georgios Varouxakis, *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 on France and the French* (Palgrave, Basingstoke, 2002), pp.67-68.

⑤ Charles Kingsley, *The Roman and the Teuton* (Macmillan, Cambridge and London, 1864), pp.39-40; Wal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187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lter Bagehot*, ed. Norman St John-Stevas, 15 vols. (The Economist, London, 1965-1986) vol. 7, pp.126-127.

种族主义和敌对态度保持距离,同时继续坚持着卡莱尔所传播的道德力量。道森的回应,我认为是很多“早期卡莱尔主义者”看待“晚期卡莱尔主义者”的典型态度,可以用评论家 W. E. H. 莱基(W. E. H. Lecky)的话加以总结:

尽管卡莱尔教导了我们很多,他的作品也是一种最为宝贵的道德力量……我认为,在他的作品中,在那些具有不朽价值的语句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被夸大的、单方面的、不理智的东西。但在接受这些的同时,没有人能否认他的作品伟大的道德基调。^①

这些仅仅触及了卡莱尔主义者内部对他的种族观念的一些回应。也有很多其他被认为更富有同情心的人对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例如条顿优越论历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Teutonist historian Edward Freeman),在1873年写信给他的朋友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时说:“我(曾经)读过卡莱尔的一页作品,但它似乎是莫名其妙的咆哮,以至于我再也没有读过了。”^②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有关工人阶级自学成功者阅读卡莱尔作品的研究,揭示了关于解读和选择性吸收的情况空前的多样化。^③ 简而言之,卡莱尔对于生物种族主义的坚持并不能被视为是“时代的迹象”或“民族的脉搏”的体现;我们需要去考虑他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具有多大的权威,在哪些领域拥有权威,以及这样的权威是如何因为他自己思想急剧的转变而受到影响的。^④

研究权威社会思想家作品中的种族主义话语是一种研究策略,文化史家以此方式试图展示一种占据主导的种族话语在19世纪中期的存在;另一种方式是探索生物理论本身。这也有其优点,有助于从生物和伦理史中发掘出本来模糊的轨迹,比起密尔和卡莱尔的思想,生物理论的发展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还有丰富的主题完全没有被发掘出来(科学史家确实没有探索这些内容)。但如果开始检验这些主题的“投射”的时候,也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让我们用罗伯特·诺克斯的历史来解释这一点。

诺克斯是一名苏格兰解剖学家,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因为对杀人凶手伯克

① W.E.H. Leck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ssays*, new edn. (Longmans, Green, London, 1910), pp.95-105.

② Freeman to Bryce, 13 Apr 1873; W.R.W. Stephen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dward A. Freeman*, 2 vols. (Macmillan, London, 1895), vol. 2, pp.67-68.

③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pp. 41-47.

④ 在这里我指的仅限于“Nation Within and Without”和 *Civilising Subjects* 中 Hall 对卡莱尔的提喻用法;我对这个时期“种族”和“民族”更广范围的陈述的观点,请参见 Peter Mandler, “Race” and “Nation” in Mid-Victorian Thought’ in S. Collini, R. Whatmore and B. Young(eds), *History, Religion and Culture: Brit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175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pp.224-244.

(Burke)和黑尔(Hare)的尸体进行解剖而声名狼藉。由于愤怒和反政府情绪的日益增加,他开始从事另外一种作为大众科学演讲者的活动,兜售一种冷酷激进的物质主义,并在19世纪40年代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听众。种族在他的世界观中扮演了一种重要性日增的角色,并在他的一本书的咆哮中达到顶峰,即1850年出版的《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en*)一书。诺克斯的思想之后被一群同样反政府的激进的物质主义者吸收,他们在1862年建立了极端种族主义的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①所有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数十年间思想界发展出的关于人类各个种族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区别的争辩的一部分。但这个“部分”,是多大的部分?在过去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和种族的早期研究作品中,诺克斯并没有被纳入讨论,但是在近年来的文化史研究中,诺克斯已经被提升至一个中心地位。“这种讨论‘种族’的新方法的征兆,以及它流行的方式”,凯瑟琳·霍尔写道:“是罗伯特·诺克斯的作品带来的。”^②她说这话的依据,是因为在罗伯特·杨的《殖民渴望》

(*Colonial Desire*)一书中,诺克斯的《人类的种族》被杨视为生物种族主义的权威逐渐增长的关键文本,诺克斯本人则成为英国对种族主义文本最重要的贡献者(这种种族主义文本主要是由美国和法国作家的作品提供的),据称这种种族主义文本为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生物学观点打下了基础。杨写道:诺克斯的观点是“有影响力的”,甚至作为包括卡莱尔观点在内的观念集合体的一部分——是“占主导的”。^③

这样说的凭据是什么呢?首先,杨引用了生物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南希·斯特潘(Nancy Stepan)的作品。^④但斯特潘所用的证据基础主要存在于维多利亚时代进行生物学文章写作的作家小群体中,她并没有提供诺克斯在更广阔范围内也具有影响力的证据。从事生物学相关作品写作的作家,的确会强调生物学因素的重要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诸如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和艾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等人类学史家在研究诺克斯的时候态度更为谨慎,并没有将影响力直接

① Evelleen Richards, "The 'Moral Anatomy' of Robert Knox: The Interplay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Victorian Scientific Natur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2 (1989), pp. 373-436, 这篇文章包含了关于 Knox 思想最为完整的描述。然而,该文对 Knox 思想传播的讨论,同样存在着我对 Curtin, Hall 和 Young 的研究指出的问题。

② Hall, "Nation Within and Without", p. 192.

③ Young, *Colonial Desire*, p. 119, p. 121, p. 135.

④ Young, *Colonial Desire*, p. 197, n. 5 (同样参见 Stocking, 见下一条脚注, n. 19)。

或间接归于诺克斯一人。^① 同时,大约一代人以前着手进行的两个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对待种族的的态度最为彻底的调查,并没有多么看重诺克斯,那个时期调查文本本身比起探究其意义更为重要。这两个调查分别是克莉斯汀·博尔特(Christine Bolt)的《维多利亚时代对种族的看法》(*Victorian Attitudes to Race*)和道格拉斯·洛里默(Douglas Lorimer)的《肤色、阶级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Colour, Class and the Victorians*)。^② 其次,杨引用了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待非洲的态度的作品;科廷关于诺克斯的断言对于杨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认为,诺克斯的作品“在文学评论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接受”。^③ 科廷对于诺克斯影响力的结论比起杨的结论明

显要更为慎重,他在35年前进行了一次敏锐的调查活动,并没有将精力花在彻底细究文学评论本身。他在自己的脚注中仅仅引用了那些赞成诺克斯观点的参考文献——所以不存在作为比较的反对意见,这些赞成的参考文献总共只有三种,两种来自《爱丁堡》(*Edinburg*),一种来自《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④ 他并没有去分辨这些作者或这些所谓的赞成诺克斯的参考文献的背景,也没有将它们放在持反对意见的文献中进行分析。例如,早期《威斯敏斯特》上认为诺克斯“毫无价值”(科廷、杨或霍尔都对此只字不提)的文章。^⑤ 对这三种文献更加细致的检查揭示,实际上只有一种是对诺克斯和他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的。^⑥ 在这些微弱的支持之外,杨绝大部分是基于他对诺克斯

① Stocking, *Victorian Anthropology*, p.65. 此处认为诺克斯是“19世纪英国人类学主流之外的边缘思想”(此条批注同样出现在 n. 5 Young 作品的第197页中,尽管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这本书其余部分论证的支撑,在第119页它称Knox的思想“对此后持续的科学化种族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Adrian Desmond, *The Politics of Evolution: Morphology, Medicine, and Reform in Radical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89), pp.388-389.

② Christine Bolt, *Victorian Attitudes to Rac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71), pp.18-19; Douglas A. Lorimer, *Colour, Class and the Victorian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Leicester, 1978), pp.136-141.

③ Young, *Colonial Desire*, p.197 n. 6.

④ Philip D. Curtin, *The Image of Africa* (Macmillan, London, 1965), p.378, pp.380-383.

⑤ 实际上,我找到的能够证实在文学评论界Knox的观点有着热情的支持和接受的引用唯一直接的评论是由Curtin引用1856年的*Westminster*,但这甚至不是*Westminster*所保持路线的一贯特征,见W. B. Adams对Knox的评论,“Human Progress”, *Westminster Review*, 52(1849-1850), pp.1-30,这篇文章自身也有着激进言论但却明确地排斥Knox的观点(在第2页说它是“毫无价值的”)。

⑥ [Luke Burke?], “Types of Mankind”, *Westminster Review*, 65(1856), pp.357-386. 另外两个引用只是*Edinburgh Review*上顺带提到的文章。其中一篇[G. C. Lewis], “Lord Grey’s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Edinburgh Review*, 98(1853), pp.79-80, p.95,并没有提到Knox的名字,只是在讨论种族通婚的困难时对Knox的观点顺带做了一些积极的评价。另一篇,*Edinburgh Review*, 100(1854), p.199,并没有讨论Knox或者种族(讨论的是贸易政策);如果注释有错误,指的并不是第199页的这篇文章,而是第119页的这篇[W. E. Forster], “Kafir Wars and Slave Policy”的话,确实提到了种族通婚的问题(从第119页到第120页),但既没有提到诺克斯也没有支持他的观点(实际上这篇文章相当反对在种族通婚之间设立障碍)。

《人类的种族》的阅读,和对诸如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这样据称与诺克斯观点出自同源基础文本的分析,来断言诺克斯具备的影响力。《人类的种族》是一部丑陋刺耳的文本,提供了很多道听途说、耸人听闻的引证;它同样是印有插图的,杨也重印了其中一些令人厌恶的插图。但无论他还是那些在自己文章中引用诺克斯文字的人,都没有试图去探查《人类的种族》的流通过程,去仔细观察这些插图到底流传有多广。实际上,这本“有影响力”的书,也是诺克斯出版的唯一一本关于种族问题的书,在现实中相当少见——它于1850年出版后,仅仅在1862年重印了一次。^①大英图书馆唯一一本副本由于过度使用而支离破碎,但我可以打赌,对这本书的使用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晚期进行的。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自己的时代确实有着读者,但在当时,诺克斯的读者大多是持顽固的物质主义态度的工人阶级,那时他们的协会对文学评论和其他体面出版物毫无兴趣。^②

假如一个人对测量观念的趋势抱有真挚的兴趣,他也许会对诺克斯和 R. G. 莱瑟姆(R. G. Latham)的传播进行比较,后者也许是同时期观点传播最为广泛的人种学者,他维护传统的种族观点,即认

为种族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写作了大量关于人种学和语言学的小册子和书籍,其中很多都有多个版本,包括大受欢迎的版本。几乎可以断言,无论在精英还是在激进的工匠圈中,莱瑟姆都比诺克斯的传播范围更广。杨的确提到莱瑟姆一两次,但仅仅是将他作为被诺克斯取代的旧观念而提到——而不顾事实上莱瑟姆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诺克斯之后出现。^③莱瑟姆比起诺克斯来说的确代表了更早期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这个据称诺克斯的观点开始占据主导的时期依然充满生命力。诺克斯的文本一直是充满争议的,同时关于它具备影响力的证据只能在二手材料中找到,或者通过深挖文本本身的深度而得来,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此,对一些复杂问题的讨论不能仅仅通过选择并分析一种“症状性”文本就声称得以解决,正如诺克斯的情况一样。

文化和现代性

我并不想通过第一个案例研究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检验用作史料的那些文本的“代表性”或“影响力”的问题,通过计算这些作品的版本、检验其发行量、审视文学评论中的参考文献这样简单的方式

^① Robert Knox, *The Races of Men: A Fragment* (Henry Renshaw, London, 1850); Robert Knox, *The Races of Me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Influence of Race over the Destinies of Nations*, 2nd ed. with supplementary chapters (Henry Renshaw, London, 1862).

^② 如前述对霍尔的讨论一样,我并不想将这样的讨论扩展到关于陈述的完整领域中,仅仅是讨论诺克斯直接的影响。

^③ Young, *Colonial Desire*, p.66, p.118. 在 Hall, *Civilising Subjects*, pp.277-279 中有一篇对莱瑟姆的演讲相当中立的评论。